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丛书

湘军文稿

● 龙盛运 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湘军史稿

龙盛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丛书

湘军史稿

龙盛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年·成都

责任编辑：蒲其元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何 华

湘军史稿

龙盛运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7.0 插页5 字数350千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939-9/K·126(精) 印数：1—390册

定价：8.10元

《湘军史稿》序

一

多年前龙盛运同志同我说他要研究湘军史。盛运同志，湖南人，熟悉湖南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又是从学校起就饱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正适宜于研究这一专题，所以我十分赞成，怂恿他立即着手进行。

以前是有人撰著过湘军史的。曾入曾国藩幕府，熟悉湘军事迹的王闿运著有《湘军志》，王定安著有《湘军记》。我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抗日战争初起，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迁广西阳朔时，也以半年时间，根据极贫乏的资料写过一本《湘军新志》。到五十年代，只以检查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为目的对旧作进行过修改，改称《湘军兵志》，以与所撰《绿营兵志》、《晚清兵志》一律，表明范围只限于兵制方面，不曾再搜集资料加以补充。

2622/4001

盛运同志经过长期搜集资料，进行了艰苦的钻研，潜心的探索，现在全书脱稿了。他很谦虚，称为《湘军史稿》。他这部《湘军史稿》，与旧作都不同，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去论述湘军的建立发展和裁撤的。全书分十章，约三十五万言，上起咸丰二年，下迄光绪四年（1852—1878年）。他把湘军产生于湖南的社会背景，湘军发展的内在原因，外部影响，湘军各项制度，两湖后方基地，军饷状况，与满族贵族关系，将帅与幕僚，战略战术等方面，都一一发掘出来，进行了广博深入的钻研，并以四分之一篇幅，论述战争的过程，他的著作，包括了写战史的王闿运《湘军志》、王定安《湘军记》，和我述兵制的《湘军兵志》，而全面地完整地以政治史的崭新姿态把湘军全史再现了出来。

二

我以无限喜悦的心情阅读盛运同志这部即将付印的专著。读后，欣然领会了下面这五点：

第一，说明了湘军在湖南产生的原因。我写《湘军新志》时就首先想到这个问题，由于当时无书可考，只在《领袖与将士及他们的故乡》一章中，以一节简短的篇幅，作了一些粗枝大叶的概述。盛运同志却根据丰富的资料，从清代湖南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探求出湘军在湖南产生的原因，他指出：

湘西和湘南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既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又存在较深的民族隔阂，苗瑶等族甚至还经常武装反抗。这就使两个地区的汉族地主养成尚武斗狠，注意观察情况的传统。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

其次，湖南士人有固守程朱理学，反对汉学，又热心经世致用之学的传统。

具有这两方面传统的湖南地主阶级，在鸦片战争后，全国形势剧变之中，他们就与其他省分的地主阶级不同。盛运同志指出：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统治危机已有明显暴露，全国有识之士已有所觉察，并发出过警告。但如湖南士人这样有紧迫感，却不多见。有长期阶级斗争，甚至是武装斗争经验的湖南地主，自然不会因此而束手待毙。他们在窥察形势的同时，积极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和军事学。……又大力提倡忠节，……教育鼓舞地主士人忠于清王朝，勇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与农民革命对抗到底！

他接着指出金田起义后的情况说：

金田起义以后两年的阶级斗争进程证明，以咸丰帝为代表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已经昏庸腐朽，他们所采取的镇压措施和对策，抵挡不住农民革命的凌厉攻势。与之不同，湖南地主阶级，却在新形势下，发扬其勇健斗狠、究心经世之学的传统，在镇压本省群众和抗拒太平军的战斗中，既凶悍而又富有实效。

就在这个形势下，湖南地主阶级涌现了曾国藩这个为众所推戴的人物，他接着说：

道光末期已在本省拥有很高声望的曾国藩，这两年中奏折所表现的学识，和敢于犯颜进谏的精神，显示出了不同于一般大官僚的气质，从而获得省内士人更高的敬仰。正因为如此，在他回籍守制后，湘乡士人仍不断请他出来指导本县团练事务。而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主要幕僚左宗棠也力促曾国藩遵旨帮同办理本省团练。郭嵩焘更驰驱数百里连夜赶至曾家，“以力保桑梓”为言，敦促他应诏出山。一时之间，曾国藩几乎成了湖南地主的救世主。

盛运同志把湘军为什么会在湖南产生，为什么会拥戴曾国藩这个人物，层次分明地告诉了我们。

第二，说明了湘军的特点及其影响。盛运同志从湘军各项制度、战略战术等探求湘军的特点及其影响。他在《湘军的

组建》的结论指出：

“改弦更张”与“赤地新立”，在制度上、人事上，使湘军与经制兵八旗绿营完全分离，自成系统。而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强调对弁勇施以家人父兄式的教育，则是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固结全军上下左右的关系。自筹军饷又是建立足以自存，获得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实行帅任将，将择弁，弁招勇的层层递选制，更把官位与厚禄化作各级头目的个人恩惠，使其所属弁勇感恩图报，对之忠心耿耿。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不仅控制全军各个部门和环节，而且又是上述种种关系和情感的体现者和凝聚点。这样，就很自然成为全军将弁勇夫感恩图报，力图效忠的对象。……这样的湘军，不言而喻，必然疏远清廷，亲附将帅，这固然为曾国藩、左宗棠等结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奠定了基础，建立了实力后盾，但也使其他地主官僚，特别是满族贵族侧目而视。

由于湘军采取了这一系列与绿营相反的制度，就不仅仅在兵制上发生了变革，在政治上也必然引起变动，盛运同志这个结论概要地指了出来。

第三，说明了湘军发展的内在原因。盛运同志从湘军各大头目，后方基地，多元领导，政策措施，与中小地主的关系

等方面，探求湘军发展的内在原因。他作出结论说：

骆秉章、左宗棠等，在军事、吏治、财政三个方面，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既有重大的现实作用，又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由于击退了入境的太平军、天地会军和贵州起义军，镇压了省内群众起义，增加了财政收入，强化了封建统治，密切了地主阶级内部关系，湖南就成为湘军既稳定，又能提供大量人力财力的后方基地。

又说：

各项要政已经奏准，形成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把持厘金、团练、湘军，乃至干预地方政务已达数十年之久的士绅，在省内已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同时，随着湘军在省外战功日高，力量日强，湖南士绅在全国政治地位大为提高。这样省内外力量的结合，就有力地促使包括骆秉璋在内，任何其他湖南巡抚，都不能，也不敢轻于改变过去的政策与措施，不敢与省内士绅，特别是湘军集团相抗。

湘军之所以得到发展，由于有巩固的湖南基地。而所以取得这个巩固的基地，则由于湖南士绅具有巨大的力量。湘军发展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此。

第四，说明了湘军发展的外部影响。盛运同志探索满汉统治阶级既矛盾，又联合的传统，对湘军发展的外部影响。他指出湘军与满族贵族关系有过两次调整。第一次是咸丰五年至七年间的初步调整，即湘军大头目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满族贵族湖广总督官文的调整，他说：

在五年至七年这两年多时间中，胡林翼逐渐认清了自己和官文的地位，摸准了官文的特点，采取了明智的态度和对策，做到既接受满族贵族的监督，又不束缚自己手脚，从而出色地完成了与满族贵族关系初步调整的任务。这是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关系一个历史性突破，也是胡林翼对本集团一个重大献礼。这不仅为七年至十年这三年中，湘军经营湖北后方基地，夺取九江，威逼安庆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也为十年开始的大调整，全国范围内的合作，树立先声，提供了经验，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是咸丰十年春江南大营崩溃后，苏、常被占领，面临危急形势，咸丰帝终于不得不全面调整与湘军集团的关系，不得不改变旧方针，转而采取新方针，进行大调整。四月，任命多年不授予督抚重任的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六月，实授，并任为钦差大臣。十月，咸丰帝病死后，久已深知非依靠湘军不可能抵抗太平天国的顾命大臣肃顺，遂于两个半月之内，任命四个湘军大员为督抚。盛运同志指出：

咸丰朝共设八个总督（漕、河三督不计）、十五个巡抚的实缺，而十一年九月，湘军集团竟占总督缺两个，巡抚缺六个，比例之高是惊人的。而且大部人是破格超升，或连续升官。……这种情况说明，清廷的确抛弃了对湘军既使用，又严加限制的旧方针，转而采用依靠湘军，让湘军集团发挥反革命能量的新方针，从而使湘军集团与满洲贵族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两百年满汉统治阶级长期矛盾下，如果不经过这两次调整，湘军不可能发挥它的反革命能量。就由于调整了湘军与满族贵族关系，满汉统治阶级联合起来，才取得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这就是湘军发展的外部影响。

第五，分析和总结了战争的过程。盛运同志对各大战役都进行分析和总结，如九江湖口之役，武昌、安庆的攻围战，他对双方的部署、调遣与作战的经过，都加以详细的分析与战役结果的总结，层层论述，就好似双方的参谋部都在他的掌中一样。王闿运自称他的《湘军志》足与《三国志》、《后汉书》相衡。就即使如此，也只是旧史家的写法，与盛运同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总结的科学方法而写的湘军战史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三

我读了盛运同志这部专著得来的体会如上所述。这些体会，可能只是我所想知道的和所注意到的，很难免所见不全，体会得浅薄。

但是，就从这些看来，我已体会到这是一部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湘军全史。这样一部湘军全史是前所未有的。而从这样多方面进行探索，钻研而写成的某一时期、某一军事集团的全史，好像我国出版界也还不曾有过。

前几天看见《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史学会秘书长李侃同志在“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①。他主张要写“有骨骼和血肉、有生命和灵魂的历史，把本来就是多样复杂的历史，更全面更完整更丰满地再现出来”。我认为盛运同志这部《湘军史稿》，正与李侃同志的号召相符合。他日出版，一定是一部为多方面广大读者所欢迎的走出“史学界”的历史学好书。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罗尔纲谨序于北京

^①见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目 录

第一章 清朝的中衰和湖南的崛起 ·····	1
第一节 清朝的勃兴和中衰·····	1
第二节 湖南的崛起·····	16
第三节 湖南地主阶级的动向·····	27
第二章 湘军的建立 ·····	41
第一节 初露锋芒的湖南地主阶级·····	41
第二节 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稳定湖南的努力·····	54
第三节 湘军的建立·····	67
第四节 骨干人员的集结·····	90
第三章 初期的战争和后方基地的经营（上） ·····	109
第一节 湖南的拉锯战·····	109
第二节 武汉、九江的争夺·····	118

第三节	湖南后方基地的经营·····	127
第四章	初期的战争和后方基地的经营（下）·····	153
第一节	湖北江西的鏖战·····	153
第二节	与满族贵族关系的初步调整·····	168
第三节	湖北后方基地的经营·····	183
第五章	江西安徽湖南等省的战争 经验教训的总结·····	201
第一节	江西的胜利与皖北的挫折·····	201
第二节	经验教训的总结·····	212
第三节	湖南基地的再巩固·····	226
第六章	与满族贵族关系的大调整 广西及长江中、	
	下游的战争·····	237
第一节	与满族贵族关系的大调整·····	237
第二节	安庆的攻占·····	247
第三节	广西贵州四川的战争·····	263
第七章	鼎盛时期的诸方面	
第一节	军政实力的急剧膨胀·····	281
第二节	李鸿章左宗棠东援军的建立·····	293
第三节	营制和兵种的演变·····	311
第四节	军饷的剧增与饷源的开辟·····	328

第五节 洋务活动的发轫·····	348
第六节 军政骨干的网罗·····	361
第八章 江浙的战争 胜利后的困境·····	401
第一节 苏南浙江的争夺·····	401
第二节 天京的攻夺·····	411
第三节 胜利后的困境·····	424
第九章 晚期的战争 权力再分配格局的形成·····	439
第一节 “剿”捻的波折·····	439
第二节 边远地区的战争·····	452
第三节 权力再分配格局的形成·····	470
第十章 余 论·····	484
后 记·····	525

第一章 清朝的中衰和 湖南的崛起

第一节 清朝的勃兴和中衰

和历代各王朝一样，清朝也经历着由盛转衰，终至覆灭的过程；但其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并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特点，又使这个过程显得特别复杂。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后，为巩固其统治，维护其主导地位，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和南明势力的同时，一面为农民起义军逼迫而自杀的崇祯帝发丧，一面借鉴历朝，特别是明代的经验教训，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

在意识形态方面，推崇儒学，特别是其中的程朱理学，将原已进入孔庙两庑的朱熹牌位，抬入大成殿内，位置于“十哲”之后。又在科举考试中，强调“朱注”的权威地位。这就向汉族地主证明，清王朝是封建道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是明朝那样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正统王朝。为了笼络更多的士人，特别

是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士人，在一般科举考试之外，又开设博学宏词科，并编修《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其中后者尤为宏大，聚集士人三百余，历时十年始告完成。总之，满族贵族千方百计吸引汉族地主，力图消除他们对异族入主中原的抵触情绪。

在政府体制方面，仿照明制，中央设内阁，由大学士主持，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下设主管各个方面行政事务的吏、户、礼、兵、工、刑六个部，由各部尚书、侍郎主持。各级地方政权，省由总督巡抚主持，藩臬两司则分管行政司法等事。府县分别由知府知县主持，巡道则作为派出大员，巡察地方，督率府县。雍正时设军机处，内阁形同虚设，大学士之权由军机大臣取代，而成为一种荣誉职衔。以上中央各官名义上是满汉各半，地方官则满汉杂用。

这一切大大鼓舞了汉族地主阶级，为满汉地主阶级专政，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满族贵族没有放弃种族成见，也不愿让出其主导地位。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名义上满汉各半，实权则操于旗员之手，汉员不过备位而已。康熙帝就承认：“今满大学士凡有所言，汉大学士惟唯诺诺，并不辩论是非。”^①各部满汉尚书侍郎的地位也同样如此。“凡指挥一切者谓之当家，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②至于军权，常备军有两种：八旗，从士兵到将弁全为旗籍，约二十万人。除拱卫京城外，其他分驻全国要地，如荆州、江宁、福州、广州和成都等

^①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38，25年9月。

^②徐珂编：《清稗类钞》（1984年中华版）第10册，63页。